

敦煌晚唐“地藏十王”图像补说

郭俊叶

(敦煌研究院, 甘肃 兰州市 730020)

关键词: 敦煌; 晚唐; 地藏十王; 莫高窟

摘要: 地藏十王是唐宋以后在民间比较流行的一种信仰, 大约定型于唐代后期。本文对敦煌晚唐时期的“地藏十王”图像尤其是莫高窟第 8 窟新发现的图像做了介绍, 并认为它们对于研究此种信仰早期流布的历史具有重要价值。

Key words: Dunhuang; late Tang Period; the Ten Gods of Earth; Mogao Grottoes

Abstract: The Ten Gods of Earth began to be popularly worshiped among the common people from the Tang-Song period. Their figures may have been finalized roughly in the later Tang Period. The present paper describes pictures *Ten Gods of Earth* made in Dunhuang in the late Tang Period, especially the one recently discovered in the 8th Mogao grotto. The author believes these pictures to have important value to studying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pread of this worship.

地藏十王信仰是中国庶民佛教信仰的重要内容之一。十王即十殿阎王, 又称十殿冥王、十殿阎君等。传说人死后去冥途时, 初七日过秦广王, 二七日过初江王, 三七日过宋帝王, 四七日过五官王, 五七日过阎罗王, 六七日过变成王, 七七日过太山王, 百日过平等王, 一周年过都市王, 三周年过五道转轮王, 如斯次第受十王裁断, 斋供十王, 死者生前所作恶业之报应可望减轻。十王又与主管地狱的地藏菩萨相结合, 一起受世人崇祀。从目前见到的文献与遗迹来看, 地藏十王信仰最终定型于唐代后期。本文考查了敦煌晚唐时期的相关图像, 不当之处, 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

关于敦煌石窟壁画中的“十王”图, 目前在统计数量及年代上存在一定差异。《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下文简称《总录》)索引部分“地藏与十王厅”条列出 15 铺: 莫高窟第 155 窟(中唐), 第 6、305、331、375、379、384、387、390、392

窟(五代), 第 176、202、380、456 窟(宋), 第 314 窟(西夏)^[1]。《敦煌石窟内容总录》索引部分又增补了榆林窟第 34、38 窟(五代), 第 35 窟(宋), 合计 18 铺^[2]。通过查对《总录》内容部分与实地考察, 学者们先后将莫高窟第 155、331、387、305 窟, 榆林窟第 34 窟从“地藏十王图”的统计中除去, 而增补了莫高窟第 217 窟的一铺, 但此铺在《总录》中所定年代为晚唐, 宿白先生则归入五代^[3]。另外, 《安西东千佛洞内容总录》提及东千佛洞第 5 窟有西夏“十王变”^[4]。

经笔者核查后, 敦煌壁画中的“十王”图共 16 铺, 其中

晚唐: 莫高窟第 8、217 窟。

五代: 莫高窟第 6、375、379、384、390、392 窟, 榆林窟第 38 窟。

宋: 莫高窟第 176、202、380、456 窟, 榆林窟第 35 窟。

西夏: 莫高窟第 314 窟、东千佛洞第 5 窟。

除了东千佛洞第 5 窟的一铺“十王变”

以外，其余都是十王与地藏相结合的形式。

下面笔者对敦煌晚唐时期的两铺“地藏十王”图像作一番考查。

（一）莫高窟第8窟《地藏十王图》

莫高窟第8窟的《地藏十王图》，在《总录》中被误定为“释迦说法、四众诸王赴会”，因此长期不为人所知。

1. 内容介绍

此图位于主室南壁上部中段（门上），画面东部已毁，中部模糊，西部较清晰，残宽约110厘米，高约70厘米。（图版六，1）画面及内容如下：

中央绘一坐姿主尊（下半身较模糊，可能为半跏趺坐），有圆形头光、圆轮形身光，披风帽，着袈裟，右手执锡杖，左手托于胸前（所托物已毁，可能是宝珠）。此主尊为地藏菩萨，是唐宋时期广为流行的形象。

主尊上部两侧各绘一着大袖袍服、梳双垂髻、双手抱卷、乘云头的童子，童子旁各有一榜题，文字漫漶。即善、恶童子。

主尊下部正中绘一蹲坐狮子，旁有榜题，文字漫漶，应为金毛狮子；狮子左侧似有一僧，头部已毁，仅存部分袈裟，可能是道明和尚。

主尊下部西侧绘戴幞头、着圆领袍衫、面主尊而立的两人，主尊下部东侧残存一着袍衫立者，再东画面已毁。与西侧对应，东侧极可能亦是戴幞头、着圆领袍衫而立的两人，东西两侧合为四身冥府判官。

主尊西侧自上而下绘五身王者并于毯上，均面向主尊跪坐，着大袖袍服，执笏，其中最上面一王，头戴兜鍪，余四王戴冠。王旁各一榜题，文字漫漶，应为地狱十王中的五王，其中戴兜鍪者为五道转轮王。另五王应绘于主尊东侧，惜今已毁。

图中披帽地藏，十王，金毛狮子，道明和尚，善、恶童子，四判官等人物一应俱全，他们的装束、持物、姿势及其在画面上

所处位置都安排得有理有序，布局也十分严谨。可见，此图已经是较成熟的“地藏十王”变相。

2. 年代考订

第8窟是位于莫高窟南区北端的一个中型洞窟，坐北朝南，由甬道和主室两部分组成，开口在第9窟前室北壁，窟内残存的壁画没有重层，后代也基本没有重修过，《地藏十王图》的年代与洞窟开凿的年代一致。《总录》将第8窟定在晚唐时期，大致不误。下面再结合此窟的内容做一些分析。

第8窟主室平面呈方形，覆斗顶，正壁开一平顶敞口龕。龕内塑像全毁，设倒“凹”字形佛床。龕内顶部之壁画，《总录》未记载，它被一层清代土红色颜料涂抹覆盖，然所绘事物隐然可见：中间一攒尖顶楼阁建筑内，两身佛或菩萨对坐，楼阁南侧坐数身菩萨侍从，楼阁与诸菩萨均位于台榭上，楼阁北侧壁画已毁。从残存内容看，我们推测可能是《法华经变》之“见宝塔品”。龕外西侧画普贤变，东侧文殊变已毁。龕外西侧上部画三身趺坐佛，我们推测龕外东侧上部也对应画有三身趺坐佛，合为六方诸佛。窟顶藻井所绘为四方或五方佛，南披画观音经变（救诸苦难）。西壁画《观无量经变》。东壁画《药师经变》。南壁上画《摩利支天图》^[5]与《地藏十王图》。龕外上部残留有山花蕉叶图案，窟内有如意形瓣的半团花边饰，甬道盪形顶西披画棋格团花图案。甬道西壁画男供养人二身、比丘一身，主室门东画男供养人二身（残），门西画供养比丘二身。供养人均大如等身，男供养人头戴展脚幞头，身着绛色襦衫。从题材上看，我们认为此窟年代无疑不会早于吐蕃统治敦煌的中唐时期。

从艺术风格上看，第8窟内壁画具有唐代后期的时代特征，从技法上看，结构谨严、刻画精细，线描造型准确、生动；从色彩上看，以土黄色作地色，壁画以赭、黄、

绿色为主,色调柔和温馨^[6]。江琳先生对敦煌中、晚唐后壁一龛窟的分期研究成果,也表明莫高窟第8窟年代在归义军张氏晚期^[7]。

值得注意的是,第8窟实际上是第9窟的耳洞,壁画的色调、技法等有年代可考的晚唐第9窟基本一致。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将莫高窟第8窟的时代定在晚唐时期是合适的,第9窟开凿于公元892年左右^[8],则第8窟也应距此年不远。

(二) 莫高窟第217窟《地藏十王图》

1. 内容介绍

第217窟《地藏十王图》实际上是一组图像,分为十二个单元,甬道顶南、北披各六个方格,每格之间用菱形边饰分隔。

南披六格从外至内(东至西)依次为:第一格,一王者(戴冠,着大袖袍服,双手合十,下同),面朝西跪坐毯上,左右各立一侍者(着襴衫,抱卷,下同)。第二格,像毁,存方格上缘。第三格,一王者,面朝西跪坐毯上,左右各立一侍者。第四格,中央画地藏菩萨(有圆形头光,正面,着双领下垂式山水袈裟,半跏趺坐,右腿屈,左腿下垂,右手于右胸前,左手托火焰宝珠,下同);主尊右侧画一由地升起的云头,云上似跪有一人,右侧下角画一火上汤镬,旁立一裸身鬼;主尊左侧下角画一畜生,似为牛。(图版六,2)第五格,一王者,面朝东跪坐毯上,左右各立一侍者。第六格,一王者,面朝东跪坐毯上,左右各立一侍者。

北披六格从外至内依次为:第一、二格,毁。第三格,一王者,面朝西跪坐毯上,左右各立一侍者。第四格,中央画地藏菩萨;主尊右侧一人裸身披帛,双手挥举,双腿后摆,呈悬空舞动状,右侧下角似有一畜生,较模糊;主尊左侧下角立一裸身小鬼,躬身合十。(图版六,3)第五格,一

王者,面朝东跪坐毯上,左右各立一侍者。第六格,一王者,面朝东跪坐毯上,左右各立一侍者。

上述各单元虽有一定独立性,但相互之间仍有呼应关系。从诸王的朝向来看,无疑是以每披的地藏像为中心。六道似乎也被分成两半,两披对合起来才完整。因此这组图像统一定名为《地藏十王图》也未尝不可。

2. 年代

《总录》定其年代为晚唐,宿白先生则将其归入五代时期。甬道南北壁与主室东壁门北沿的供养人像不是一个时代,《总录》认为分别为晚唐与五代时期,大致不误。

东壁门北沿的供养僧人题为“应管内释门都僧政、京城内外临坛供奉大德、毗尼藏主阐扬三教大法师、赐紫沙门洪认一心供养。”^[9]这个洪认大概就是S.474v《戊寅年(918)三月十三日行像司算会分付绍建等斛斗数纪录》中的“法律洪忍”,此文书末还有“管内都僧统法严”的署名。按,据考证法严任都僧统的年代在917年至926年之间^[10]。第217窟洪认的题衔比S.474v文书所署要高,绘像年代在无疑公元918年之后,因此定在五代时期是恰当的。

此窟《地藏十王图》与甬道南北壁晚唐供养人像属于同一层位。从壁画色彩上看,采用了土黄色作地色,色调柔和温馨,笔者认为将其比定在晚唐时期也是合适的。

二

莫高窟第8窟与第217窟“地藏十王”图定在晚唐时期,还在于它们特殊的式样。

曹氏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壁画中地藏十王图多位于甬道顶中央,而第8窟《地藏十王图》则位于主室门上,第217窟地藏、十王虽然在甬道顶,却不是顶中央,而是分置于两披,地藏重复出现,六道对半分绘,这些处理形式都较特殊。

五代宋以后,敦煌“地藏十王”图无

论壁画还是绢、纸或麻布画，在布局上都有一定的程式，大体可分两类，一类为地藏居中，两侧从上而下分绘十王，每面五王，有的还绘有判官、道明和尚、善恶童子、金毛狮子等；另一类则将十王、判官等画像置于地藏像的下部^[11]。

如果一定要归类的话，第8窟《地藏十王图》可以归属前一类，但是它与这一类中的其他图像不完全相同。在五代宋时期的前一类图像中，虽然王者或跪于胡床或毯上，或坐于案后，但是在同一幅图中，每一身王者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小的独立单元，这也符合了依次做斋的程序，然而第8窟《地藏十王图》则是五王并于一毯上，间隔不明显，这种较紧凑的安排，在敦煌五代宋时期的《地藏十王图》中较少见，而我们却注意到，在附图本《阎罗王授记经》扉画说法图中，采取的就是这种紧凑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只是在主位将地藏换成了佛及弟子。因此，藏经洞所出《十王经》扉画的布局形式至少可以追溯到第8窟《地藏十王图》。

第217窟《地藏十王图》属于一种松散的布局，每一身王者形成一个独立的单元，这种处理方式在后代的《地藏十王图》中得到了继承，有趣的是，如果将第8窟与第217窟《地藏十王图》的两种式样结合起来，就形成了后代十分流行的上述前一类布局。

可以看到，在第8、217窟《地藏十王图》中，诸如地藏形象和王者形象，每身王具有一定独立性，十王自上而下对半分列于左右，六道、道明和尚、金毛狮子、善恶童子以及四判官等等，都成为五代宋以后地藏十王图像构成的基本要素，不同的是晚唐时尚未形成曹氏时期的固定格式。这反过来也证明，第8、217窟《地藏十王图》是敦煌相关图像程式化以前的作品。

敦煌晚唐时期的《地藏十王图》也显

示了区域性的特征，试以冥府判官为例。判官是诸王之下负责各曹司具体审判的主管，变相中作头戴幞头，身着圆领襦衫的官吏形象。第8窟中绘四判官，曹氏时期敦煌十王图也一般绘四身或两身判官，以四身为多，可能取管摄四方之意。根据题名来看，两身可能是四身的简省形式，如绢画MG.17662《地藏十王图》有四身坐于藤座上的判官，分别题为“赵判官”、“崔判官”、“王判官”、“宋判官”，而MG.17793中地藏前左右侧各有两身站立的判官，分别题为“地府判官”、“天曹判官”，同样是四身，但一个以姓氏称名，另一个则以曹司称名，且不混用，可能因为曹司称名系统，出现了省绘成两身判官的做法。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20号龕《地狱变相》中的“现报司官”、“速报司官”也属于以曹司称名的系统，但提法与敦煌不同。四川安岳圆觉洞五代第60、56号龕所雕诸相，与敦煌本《佛说十王经》插图内容有一些相似之处，但圆觉洞流行六身判官，第60号龕存题名的有“曹判官”、“生广判官”、“□判官”、“延年判官”、“赵判官”等，其中的“赵判官”在敦煌经常出现，“曹判官”不知是否就是“天曹判官”，“生广判官”（可能是“生死”或“生府”）与“延年判官”在敦煌则没有看到。敦煌本《佛说十王经》中有“纳状奏上六曹，善恶童子奏上天曹地府官等，记在名案”、“一十八重一切狱主、阎罗天子、六道冥官礼拜发愿”等经文，则圆觉洞的六身判官可能仿六曹制度分管六道众生，《冥报记》卷下“唐柳智感”条也记“曹有判官五人，连感为六”^[12]。我们还注意到，第60号龕在对判官的称名系统上似乎不止一个，既有以姓氏称，如“赵判官”，又有以职司称，如“延年判官”，这种现象在敦煌的同一幅变相中也没有出现过。

（下转130页）

- [35] 饶宗颐初纂,张璋编纂. 全明词·姚广孝. 北京: 中华书局, 2004: 158.
- [36] a. 池敬嘉. 姚广孝曾随郑和下过一次西洋. 文史知识, 2005, (7).
- b. 姚广孝随郑和下西洋蠡测. 见: 纪念郑和下西洋 600 周年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766 ~ 772.
- [37] 有关详细考证, 参见拙文. 姚广孝真的下过西洋吗. 江苏社会科学, 2007, (5).
- [38] 王国维. 王国维论学集.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 1997: 38 ~ 39.

- [39] 由《逃虚子集附录》将南碑第一文中将永乐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误录为“十五日”, 可见是碑刻在前, 文献在后. 因为文献中“十五日”之误录, 显然是受同碑后文所署“十五日”的影响. 而若《逃虚子集附录》在前, 后出的碑刻不可能再凭空编造出“二十九日”的说法.

(责任编辑: 辛 革)

(上接 119 页)

三

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 地藏十王信仰形成于唐代后期, 五代、宋时期开始广泛流行. 目前见到的相关文献与遗迹资料, 绝大多数为五代、宋时期, 属于晚唐时期的极少, 如四川资中西岩第 83 龕, 是现知最早题有年代的“地藏十王”窟龕, 存有唐昭宗光化年间 (898 ~ 901 年) 的铭文^[13].

莫高窟第 8、217 窟出现的“地藏十王”图像, 证明了晚唐时期此信仰在敦煌及河西地区的流传. 莫高窟第 8 窟“地藏十王”图像, 可能是目前可考年代的最早“地藏十王”图像, 它不仅为地藏十王信仰形成于唐代的观点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将促进此信仰早期流布历史的研究, 还进一步提升了敦煌地区在此信仰流传史上的地位.

- [1]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 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2: 255.
- [2]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285 ~ 286.
- [3] a. 宿白. 敦煌莫高窟密教遗迹札记. 文物, 1989, (9、10).

b. 罗华庆. 敦煌地藏图像和“地藏十王厅”研究. 敦煌研究, 1993, (2).

- [4]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石窟内容总录.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6: 223.
- [5] 张小刚. 敦煌摩利支天经像. 见: 敦煌研究院编. 2004 年石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 (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 [6] 段文杰. 唐代后期的莫高窟艺术. 见: 段文杰. 敦煌石窟艺术论集. 兰州: 甘肃人民出版社, 1988: 196 ~ 223. 史苇湘著. 丝绸之路上的敦煌与莫高窟. 见: 史苇湘. 敦煌研究文集·敦煌历史与莫高窟艺术研究. 兰州: 甘肃教育出版社, 2002: 45 ~ 123.
- [7] 江琳. 敦煌中、晚唐后壁一龕窟的分期研究. 美术史论, 1992, (1).
- [8] 贺世哲. 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 见: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 [9] 敦煌研究院编. 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6: 101.
- [10] 荣新江. 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285.
- [11] 罗华庆. 敦煌地藏图像和“地藏十王厅”研究. 敦煌研究, 1993, (2).
- [12] [唐] 唐临撰, 方诗铭辑校. 冥报记.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78.
- [13] 张总. 地藏信仰研究.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 197 ~ 198.

(责任编辑: 辛 革)



1. 第8窟主室南壁的地藏十王



2. 第217窟甬道南披的地藏王



3. 第217窟甬道北披的地藏王

敦煌晚唐的地藏十王图